“文化即批判”：殷企平与利维斯、威廉斯、伊格尔顿对话中的“转型焦虑”

“Culture as Criticism”: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in Yin Qiping’s Dialogue with Leavis, Williams and Eagleton

胡　强（**Hu Qiang**）

内容摘要：“文化即批判”是殷企平文化批评思想的核心命题，揭示了19世纪英国知识分子从“文明辩护者”向“文明批判者”的根本转变。这一命题的凝练与深化，始终体现于他与利维斯、威廉斯、伊格尔顿三位理论家的对话之中。殷企平重释了利维斯“少数人文化”与“有机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将利维斯对技术功利主义的批判转化为对“整体性”价值观的守护。殷企平将“情感结构”与“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立场相融合，通过“愉悦理论”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想从理论描述转化为诗学建构。在与伊格尔顿的对话中，殷企平强化了文学的公共性建设议题，将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批判提升为更具公共建设性的思想启蒙。“转型焦虑”贯穿于这三重对话，勾勒了英国文学家对工业化进程的回应，也体现了殷企平对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关切。通过将英国现代化经验与中国当代语境的参寻与互释，殷企平系统考察并转化了英国文化批评传统，推动了外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创新。

关键词：殷企平；利维斯；威廉斯；伊格尔顿；文化批评；转型焦虑

作者简介：胡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区域与国别研究。

Title: “Culture as Criticism”: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in Yin Qiping’s Dialogue with Leavis, Williams and Eagleton

Abstract: “Culture as Criticism” stands a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Yin Qiping’s cultural criticism, which lays bare the fundamental shift of British cultural ideologies in the 19th century—from defenders of civilisation to critics of civilis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further elaboration of this proposition run consistently through his intellectual dialogue with three theorists: Leavis, Williams and Eagleton. Yin Qiping reinterprets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Leavis’s notions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the “organic community,” translating Leavis’s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utilitarianism into a defence of holistic values. He integrates Raymond Williams's concept of "structures of feeling" with the literature-centred critical stance, and elevates Williams's ideal of common culture from theoretical narration to poetic construction via a theory of pleasure. In his engagement with Terry Eagleton, Yin reinforces 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ture's public dimension, recasting Eagleton's critique of aesthetic ideology into a more constructive form of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permeates these three layers of dialogue. It delineates British literary intellectuals' responses to industrialisation, and also encapsulates Yin Qiping's concern over 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mutually interpret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Britain's modernisation experience against China's present context, Yin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and appropriates 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reby advancing paradigmatic innovation for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Keywords: Yin Qiping; Leavis; Williams; Eagleton; cultural criticism;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Author: Hu Qiang, Ph.D.,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ea studies (Email: huqiang418@xtu.edu.cn).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殷企平的关注多集中于其共同体理论的文本分析与理论建构。在这些关注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学术命题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揭示。贯穿殷企平批评实践的核心是什么？在与利维斯（F.R. Leavis）、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对话中，他究竟完成了怎样的突破？更为关键的是，这位中国学者为何要倾注心力去阐释19世纪英国文人对"进步"话语的焦虑？殷企平通过研究发现，在19世纪英国批评系谱中，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其成熟标志并非源于对既有文明的不加批判的肯定，而是与"文明"观念的决裂与思想重塑。文化不再是文明的辩护者，而成为其最坚定的批判者。然而，只是提出"文化即批判"（殷企平，"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43），尚不足以解释这一命题背后的思想动力。殷企平进一步借助"转型焦虑"这一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构建了"文化即批判"得以生成与深化的语境与机制，重构了一种富于思辨性的批判范式。"转型焦虑"体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集体心态，体现了对机械文明的焦虑、对进步代价的困惑以及对分裂现实的不安。

殷企平对19世纪英国进步话语的反思，可以说是一场将文学文本嵌入历史进程的思想实验，其最终指向了一种以英国经验为镜鉴的中国关怀。在殷

企平的笔下，批评成为了一面棱镜，通过细读捕捉短时段的文学事件，追溯中时段的语境变迁，叩问长时段的结构演进，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域外的观照与借鉴。在"狄更斯《董贝父子》中的'铁路意象'"一文中，铁路被描述成一个改变19世纪英国社会进程的"事件"，它改写了人与时空、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工业社会对个体情感与民族意识的冲击。铁路既是物质进步的象征，也带来了心理的震荡与社会关系的重组。[1]"在'进步'的车轮之下——重读《玛丽·巴顿》"一文中，殷企平聚焦于女主人公初次搭乘火车的情感体验，分析了社会流动与物质异化的隐性关联。火车上转瞬即逝的个人感受，与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短时段事件相互契合，而殷企平正是从这种短暂而强烈的个人化经验中，捕捉到了一个转型时代对于速度变迁的矛盾心理。[2]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构成了殷企平理解特定社会症候的重要参照。19世纪的"新型小说"何以捕捉到了"正史"上难以归类的情感特质？卡莱尔（Thomas Carlyle）、阿诺德（Matthew Arnold）、罗斯金（John Ruskin）、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面对变革浪潮，不断追问着"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有质量的生活？"（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11）殷企平将卡莱尔等人与代表当时进步话语的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等史家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后者所代表的主流话语已经变成了一套"理所当然的'真理'"，这是两种彼此对抗的话语体系，麦考莱所代表的以"文明""进步""成功""交易""契约""消费"和"快速"为核心，而几位哲人则在追问中完善了另一套以"文化"为统帅，涵括"平衡""和谐""工作""英雄""心灵""艺术""生命""创造性愉悦"等关键词的意义之网。[3]这些关键词不仅构成了殷企平分析情感结构的理论视野，也为他探究文学如何因应社会变迁，重塑人类精神图景，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资源。

六卷本《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代表了殷企平文化批评的系统设计。将文化观念的演变进程细分为萌芽、生长、成熟、拓展、裂变五个阶段，这本身就是一次基于长时段史观的批评实践。在殷企平看来，文化观念是"支配一个民族总体生活方式的思想观念"（殷企平 胡强 2），这些观念被置于历史演进的深层结构，缓慢却持久地支配着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长时段思维要求人们摆脱短期焦虑，将个体与社会放置于漫长历史进程中来进行系统性、结构化理解。通过解构19世纪英国的进步主义话语，殷企平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绵延却深刻的警示，以"进步"为名的功利思维不仅会误导民众，也会撕裂民族精神。殷企平早年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的系统训

1 参见 殷企平："《董贝父子》中的"铁路意象"，《外语与外语教学》1（2003）：37。

2 参见 殷企平："在"'进步'的车轮之下—重读《玛丽·巴顿》"，《外国文学评论》1（2005）：91。

3 参见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40页。

练，这为他后来从事文化批评奠定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在“纽曼大学观探微”一文中，殷企平分析了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心智培育”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深远影响。在他看来，“一个高明的医生在治病救人时，总是着眼于治本，而不是治标”，纽曼所用来“治本”的方法就是“智力训练”（146）。这种“智力训练”促使殷企平不断聚焦普遍存在于高等教育中的“文理分裂”，同时也让他对功利化时代开展文化批评有了更为紧迫的现实认知。殷企平的“文化即批判”与转型带来的精神境况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联？他是如何通过与利维斯、威廉斯、伊格尔顿三位理论家的对话构建了自己的批评范式？这一范式对于推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反理论”与文本细读

重返利维斯，殷企平以对话者的姿态重新激活了这位批评家的活力，同时也以细读的方式展现了利维斯批评的当代价值。两者之间的对话，并非简单的影响与接受。这场对话以“转型焦虑”为纽带，体现了双重逻辑，一是在理论层面，殷企平重新审视了利维斯的思想遗产，揭示了利维斯在“反理论”标签下被遮蔽的思想洞见。二是聚焦于具体作品文本，殷企平通过细读，拓展了利维斯诗学范式的本土化创新。利维斯笔下的“有机共同体”体现了对快速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的抗拒。然而，殷企平没有停留于利维斯以“少数人文化”守护传统的精英主义路径，而是在重释的过程中，提炼出了一套基于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资源，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凸显现实关切的理论自觉。利维斯式对语言和形式的敏感如何转化为殷企平捕捉变迁压力与转型特质的工具？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利维斯批评的四个关联性话题进一步展开：以精英式文化抵御大众文明的侵蚀、以文学阅读为纽带挽救社会有机体的危机、以文学的“伟大传统”为坐标消解技术功利主义的价值偏狭、以文学教育为根基强化共同体的思想塑形。在利维斯看来，机械文明疏离了传统文化，其根源在于偏执的技术崇拜与扭曲的功利化追求，工业革命以前的乡村是一个有机连续的社群整体，而工业文明的负面后果之一则是将这个社群整体撕裂为碎片。

通过“用理论支撑阅读——也谈利维斯的启示”一文，殷企平还原了利维斯作为理论建构者的本来面目。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在经受了由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人刮起的阵阵飓风之后，重温利维斯确实让人倍感亲切”（50）。这句话锚定了殷企平接受利维斯的起点，也揭示了他重返利维斯的问题意识。当理论大潮席卷而来，利维斯那种以细读为中心、以价值追问为旨趣的风格，更显得弥足珍贵。“当我们再次向利氏寻求启示时，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迷惑：文学阅读真的能远离文学理论吗？”（50）这一追问直指利维斯批评实践中最具争议的特质。利维斯曾言辞激烈地反对文学批评的哲学化倾向，甚至自称是一位“反哲学家”，这种姿态使他长期背负“反理论”的标签。殷企平

没有被“反理论”的表象所迷惑，而是深入利维斯批评的内在肌理，揭示其长期被遮蔽的理论底蕴。在殷企平看来，利维斯虽然反对文学批评的哲学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斥理论。事实上，利维斯的批评实践深受多种哲学传统的影响，他的“反理论”姿态有助于兼收并蓄，同时也让他“对理论的危险性有着高度的警惕”（52）。“有机统一体”“少数人文化”以及“反技术功利主义”，这些都是利维斯批评体系中极富创见的理论构建，利维斯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有着自己独特而笃定的理论自觉，殷企平对利维斯“反理论”标签的祛魅，已经使利维斯从一位“反对理论”的批评家转变为一位拥有“独特标准”的理论建构者（52）。

在“《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一文中，殷企平展现了细读思维对批评定式的修正。在他看来，《多佛海滩》（“Dover Beach,” 1867）并未一味倾泻“悲情”与“绝望”，相反，阿诺德通过“海潮”和“夜战”两组意象传递出深刻的言外之意，“信仰的海洋”似乎已经“退潮”，而在其深层却积蓄着积极的文化动能。在殷企平看来，当悲观主义与文化命题交织在一起，它是否也蕴蓄着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力量？在“海潮”意象的涨落节奏中，殷企平似乎也听到了对文化危机的深层拷问：“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有质量的生活？”（84）阿诺德无意于哀叹信仰的失落，而是以诗为媒介，回应了那个时代愈发深重的思想危机。通过解读“海潮”与“夜战”两组意象，殷企平揭示了这首诗所蕴含的深层意蕴。这一批判路径与利维斯所主张的文学道德功能及文本细读方法可谓一脉相承。也正是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层层铺垫与延展，《多佛海滩》在殷企平的批评视域中已超越了个体情感的宣泄，升华为对维多利亚时代主流进步话语的深刻批判。

在分析《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时，殷企平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数字化’成了一种荣耀，葛擂硬先生就是这种荣耀的代表”（《推敲“进步”话语》 83），葛擂硬沉醉于数字算计与事实推理之中，无论是参与公共生活，还是在他的私人世界，所有的结论都是用数字“算”出来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用漫画式的笔法刻画了人“被简化为数字”的过程，批判了极端功利主义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肢解。而殷企平则进一步强调，“在数字构成的世界里真的是应有尽有吗”，这一追问直指数字泛滥对心智培育的摧残，这种泛滥对生活本质的遮蔽意味着“灵魂的堕落或精神的空虚”（《推敲“进步”话语》 89），意味着现金交易对人性的戕害。在细读葛擂硬的过程中，殷企平剖析了社会心理中的非人化倾向，展现了错误思潮对日常生活的深层腐蚀。这种腐蚀绵延于整个工业化进程，其后果正如批评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所言，人们往往“只学会了用数字计算”，却没有能力“批判金融原则”，更不会“认识到现代社会过度依赖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崇拜”（切斯特顿 275）。

“转型焦虑”是殷企平学术思想体系最具辨识度的概念之一，其提炼与阐发本身就浸润着利维斯的思想滋养。在“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一

文中，殷企平指出，这部作品“从头至尾凸显着焦虑的特征”，这种焦虑不仅体现了“私人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殷企平，“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 100）。利维斯深刻地揭示了技术功利主义所引发的文化撕裂与社会危机，他的批评体现了对工业革命的深层反思。殷企平接受了利维斯的影响，将“转型焦虑”提炼为一个呈现个人与国家精神叙事的统摄性概念。在他看来，“《心之死》跟文化观念史形成了互动”，这种互动拓展了“转型焦虑”等文化观念的内涵，“尤其是揭示了这种焦虑的趣味和伦理层面。惟其焦虑重重，所以生活方式——亦即文化——出现了问题”（殷企平，“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 106）。这段分析以点带面，勾勒了 19 世纪英国文学家对工业革命的想象与回应，也呈现了殷企平立足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关切。利维斯笔下的“有机社会”是有机连续的整体，利维斯对“伟大传统”的建构体现了对人性与道德的深刻关怀。在“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中，殷企平指出，“利维斯把语言、文学和人类社会创造力之间的整体关系阐述得十分透彻”（殷企平，“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 45），利维斯的路径显现出精英主义的局限，殷企平对此有所吸收更有扬弃。他在坚持批判性的基础上，提出“愉悦理论”与“公共精神”，将共同体从精英式的话语进一步拓展为体现民众意识的伦理共情与审美愿景。这一递进，使他的批评实践更具包容性和公共情怀。殷企平之开拓在于，他以利维斯的批评为起点，将社会失范、变迁惶惑与有机整体的价值观相对接，呈现出对特定时代精神嬗变与观念演进的深刻洞察。工业文明带来的思想分裂肢解了传统的经验世界，价值观被祛魅，社会关系被扭曲，而“转型焦虑”正是文学家面对这一时代症候的心灵反应。如果说，利维斯是以回溯传统来修正现实，那么殷企平则是立足于当下，以更强烈的问题驱动构建了一套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批评话语，为“文化即批判”这一命题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二、情感结构与共同文化

威廉斯通过“情感结构”这一概念试图捕捉特定时代人们的共通经验，但未能就其具体内涵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在殷企平看来，情感结构是指“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感受”，尤其是那些“正在形成中的”、还没有得到“清楚的鉴定、分类和理性化的表述”（殷企平 胡玲玲 87）。通过对《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 1848）《小杜丽》（*Little Dorrit*, 1857）等小说中“铁路意象”和“进步话语”的细读，聚焦于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抑郁、恐惧、痛苦等心理，殷企平将情感结构具化为人物、情节与背景中的心灵不安与认同危机，在这一吸收与转化的过程中，殷企平为何始终坚持“以文学为中心”的批评立场？他提出的“愉悦理论”如何在吸收威廉斯“共同文化”理想的同时，将文学的社会学批判上升为一种体现公共性的共同体诗学建构？

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2018）一书中，威廉斯聚焦于

“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五个关键词，系统梳理了 18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英国文化批评的系谱发展，分析了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威廉斯重释了文化概念，并将其最终界定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威廉斯，《文化与社会》22）。这一界定打破了传统观念将文化等同于精英思想或高雅艺术的狭窄理解，使文化研究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批评实践。对威廉斯而言，“情感结构”具有原创性，也是殷企平与他展开对话的接榫点。“情感结构”所指涉的是特定时代人们的价值共识与伦理共鸣。威廉斯用这一概念铺就了沟通文学和文化的桥梁，将个人经验与集体情感以结构化的方式重置于社会变迁的复杂进程，揭示了生活现实对文学生产的精神塑形。威廉斯认为，“19 世纪英国的优秀小说家们捕捉到了那些‘正史’上找不到的情感结构”（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12），这一论点为殷企平的学术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殷企平看来，18 世纪以降，“进步”一词一度成了人们尊奉的真理，在“进步”的洪流之中，人类取得了工业革命的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殷企平对威廉斯的吸收体现了一种理论自觉。在他看来，文化观念是“文学典籍中所体现的、具有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内涵的、支配一个民族总体生活方式的思想观念”（殷企平　胡强 2）。在这一界定中，文化观念并非外界赋予文学的额外意义，而是始终内蕴于文学典籍的生成与发展过程。

殷企平没有用小说来证明历史，而是不断强调，虚构的小说有时候可以比史书更具真实性，文学不是历史的被动反映，文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不断参与着历史的建构。从文学补益历史到文学本身就是另一种历史，这一方法论上的深化有助于理解殷企平与威廉斯对话的深层内涵。殷企平指出，威廉斯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研究者更多聚焦于他作为文化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的一面，而对其理论所蕴含的文学特质和审美内涵则重视不足。威廉斯在分析狄更斯小说中的“铁路意象”时说道，火车带来了巨变，而狄更斯更关心的是那些“史无前例的变化”和“面目全非的风景”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良善”（威廉斯，《乡村与城市》　231）。在殷企平看来，《董贝父子》中的铁路象征了人类在物质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更体现了一种颠覆既有秩序的“暴力”。它碾碎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殷企平对《董贝父子》《小杜丽》中“进步异化”主题的分析，正是他对威廉斯情感结构的创造性运用，他没有抽象地讨论 19 世纪变迁加速期的个体感受与集体情感，而是聚焦于铁路意象的叙事功能和象征内涵，以“普通读者”的审美视角“读”出了人物内心的期待、忧虑与恐惧，“读”出了“转型焦虑”所带来的迷思与沉重。[1] 在分析《艰难时世》时，殷企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方法。他指出，许多评论

1　“普通读者”事关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在殷企平看来，“普通读者的消失，标志着文学批评的异化”。“作为审美愉悦的试金石，普通读者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在文学批评异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还普通读者应有的地位，已成当务之急。”，参见 殷企平：“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6-54。

家都误读了狄更斯回应“进步”话语的方式。学界一般认为，《艰难时世》对于阶级情节和工业主题的处理是一个败笔。而殷企平则在文本细节的梳理中发现，小说中反资本主义和反功利主义这两条主线并没有中断，而是“形成互动，共同发展，互相交织，相生相灭”（“对所谓《艰难时世》中‘败笔’的思考” 25）。可以说，殷企平与威廉斯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同一批 19 世纪英国小说的解读而展开的。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结构，而殷企平则以问题意识不断修正补充其核心内涵，使其从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一种可操作、可感知的文学批评方法。

在殷企平看来，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小说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和躁动”（殷企平 胡玲玲 88），这种情绪显现出集体无意识背后的思想震荡与秩序失范，也呈现出社会万象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断裂。正是凭借有机联结的批评意识，殷企平得以将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从社会学层面的描述提升为文学批评中的可操作方法。针对 19 世纪英国文学家对工业革命的回应，殷企平以“转型焦虑”这一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一论断并非悬空立论，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在情感结构与历史实践的交界处捕捉到了那些未被言明的精神悬浮与情感波澜。殷企平对威廉斯的吸收伴随着深刻的反思，他不是威廉斯理论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继承其核心洞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既植根于细读、又指向共同体价值建构的路径。威廉斯拓宽了“文化”一词的内涵边界，殷企平则以其跨学科的诗学建构为“文化即批判”赋予了坚实的问题关切。在这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中，“转型焦虑”已从一个关联心灵建设的文论概念，在殷企平笔下最终变成了一个关乎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命题。

三、“走向公共精神”

殷企平与伊格尔顿之间的对话，涉及趣味、审美、意识形态、公共精神等诸多关键词。作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聚焦政治、话语与权力的互动共生，而殷企平则倡导以文学细读为进路的文化批评研究。这两种批评取向之间，既有着深刻的理论共鸣，也暗含着微妙的伦理张力。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 2017）中，伊格尔顿指出，“文学作品在道德价值上的共识可以超越时间”（《文学事件》 83）。殷企平深刻把握了这一论断的深层意涵，在他看来，伊格尔顿的“道德转向”实则源于一种“转型焦虑”，而这一焦虑恰恰体现了文学家们对机械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集体回应。伊格尔顿指出，19 世纪的英国，“从阿诺德到罗斯金、佩特（Walter Pater）、王尔德（Oscar Wilde），尤其是亨利 • 詹姆斯，共同推动了‘道德’一词的意义从法则和规范到价值和品质层面的转移”（《文学事件》 66）。道德含义的转变意味着时代需要一种新的言说范式来对抗伦理失衡的威胁。就“道德转向”出现的原因而言，殷企平主张在文学典籍与文化观念的深层互动中来寻找答案。他指出，道德转向是文化观念流变的结果，是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所引发的普遍焦虑的产物，一批优秀的作家以诗性而敏感的文学语言回应了时代的困境，为文化观念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吉辛（George Gissing）、哈代（Thomas Hardy）等人的创作，无不透露出对道德失序与审美堕落的忧思。这种忧思的深层，关乎社会转型的思想路径，更指向了民族良心的重塑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构。

在汲取伊格尔顿理论洞见的同时，殷企平完成了怎样的本土化转换？在两者的对话中，"转型焦虑"经历了从分析对象到阐述方法再到跨文化命题的三重递进，这一递进如何使殷企平的批评实践获得了超越单纯学术引介的思想史意义？理解这个深层逻辑，首先需要把握伊格尔顿文化批评的核心内涵。伊格尔顿的思想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两大传统，在《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2001）一书中，伊格尔顿重新定义了审美的文化内涵及其批评潜力，探讨了自启蒙运动至后现代主义期间美学、文学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虽然审美判断并不稳定，但社会的同情必须以之为基础，政治生活的结构必须与之相协调"（43）。殷企平对伊格尔顿的吸收借鉴，在"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一文中得到了深入的阐发。殷企平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伊格尔顿的批评立场，而是捕捉到了"趣味"一词在伊格尔顿理论体系中见微知著的独特意义。殷企平在文中指出，"在伊格尔顿笔下，'趣味'的涉及面很广，上至信仰、价值、意识形态和审美标准，下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风俗习惯，不过其核心内涵则是价值判断 / 鉴别"（72）。在殷企平看来，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没有止步于对权力机制的探讨，而是在批判中始终隐含着对共同体生活的期许。他没有"为了趣味而趣味"，他的趣味观分析"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提倡公共精神"（76）。伊格尔顿的辩证法不是僵化的理论教条，而是一种直指社会现实、切入矛盾表象、揭示内在冲突的批评方法。殷企平将这种辩证思维运用于文化批评，并进一步将其具化为文本细读的操作原则，在避免单纯理论推演的同时又充分激活了那些为日常生活所遮蔽的时代冲突，在文本细读与理论观照之间始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动态平衡与思想活力。

文学典籍与文化观念并非单向的佐证关系，而是在相互叩问中不断生成着新的意义。殷企平指出，"道德意义"与"虚构化（fictionalise）"的文学呈现密不可分，伊格尔顿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公共性"与"道德意义"的内在关联，他始终相信，"虚构化的道德比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更胜一筹，原因是前者比后者更能惠及公共生活"（"走向公共精神" 78）。殷企平从伊格尔顿对伯克"教养说"的反思入手，分析了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奥斯丁（Jane Austen）、狄更斯、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作家的影响，深入阐释了教养、情感、道德、理性、秩序、治理之间的深层关联。殷企平认为，"教养"一词蕴含丰厚，是理解英国文学和文

化观念的重要切入点。在伯克看来，教养比法律更重要，它呈现出一种自我审视与自我管理的思想韧性，可以使道德内化为一种更为持久的社会约束力。殷企平在“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中强调，“单靠理性，有可能导致暴力和无序，而道德想象则是秩序的保证”（46），19 世纪的英国小说以描摹现实见长，而批评的意义则在于以隐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避开简单而显性的道德评判，通过内心的省察孕育出一种共同体发展所必需的伦理共情与价值共识。

在“《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一文中，殷企平写道，这部小说“参与了启蒙运动前后有关幸福议题的对话”，“幸福”（“happy” “happiness” 和 “felicity”）作为高频词，在小说中分别出现了 137 次、76 次和 12 次，在殷企平看来，细读的目的在于挖掘字里行间的讽刺、歧义、矛盾、悖论等张力关系，“这样的频率本身就是一种言说”（27）。奥斯丁正是通过这些易被忽视的细节呈现，“以文学叙事参与了对于幸福性质、含义、形式以及实现途径的哲学思辨，揭示了现代性症候下幸福认知与伦理维度的割裂”（26）。可以说，“《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一文从问题提炼到分析方法都承袭了伊格尔顿式的辩证思维，殷企平之所以能从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挖掘出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正是依托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以现实介入为旨趣的伊格尔顿式的批评观。殷企平对《玛丽 • 巴顿》（*Mary Barton*, 1848）《名利场》（*Vanity Fair*, 1847）《纽克姆一家》（*The Newcomes*, 1855）《尤斯蒂钻石》（*The Eustace Diamonds*, 1873）《亚当 • 比德》（*Adam Bede*, 1859）等多部小说所做的“进步”批判，揭示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英国人切身感受的多重危机，这与伊格尔顿所倡导的将审美趣味同人类解放事业相联结的理论追求一脉相承。“转型焦虑”与“公共精神”是两个本质上相互呼应的理论表述。从伊格尔顿的“道德转向”出发，殷企平将“转型焦虑”提炼为统摄性的核心范畴，在伊格尔顿那里，“道德转向”被描述为个人价值观与集体品格的精神重塑，而殷企平则将这一系列概念扩大为一个民族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集体心理，他继承了伊格尔顿的批判锋芒，同时又为之注入了独特的心智启蒙的内涵。

殷企平从伊格尔顿的思想体系中选取了“趣味”这个过去被理论界相对忽视的侧面，进行了深入而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探索。在伊格尔顿批评范式的基础上，他建构了自己宏微相鉴、辩证统一的批评路径，使趣味从审美鉴赏上升为共同体建构的积极力量，这一拓展既彰显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纵深，也映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由文学事件所激发的阅读期待。从他者到本土，殷企平在对话中完成了“转型焦虑”的多重转化：从伊格尔顿的“道德转向”出发，将其具化为英国文学批评的文本实践，从中提炼出“焦虑”作为文化批评的动力机制，最后将这一概念投射到中国当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使英国经验最终变成了可资镜鉴的思想资源。“文化即批判”与“转

型焦虑"这两个概念之间，贯穿着一条以"心智启蒙"为关键词的逻辑链条。情感症候、社会症候与文学症候交织碰撞，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发展困境，使焦虑成为了19世纪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殷企平揭示了进步潮流对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批评在诊断和回应这种集体焦虑时文学家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转型焦虑"是结构性矛盾在社会情感层面的精神投射。"文化即批判"引导人们走向有机性的审美共情与价值构建，而文学经典的"心智培育"则为疗治这种焦虑提供了另一种方案。殷企平指出，"提供愉悦是文学经典的必要条件，而这愉悦必须是共享愉悦"（殷企平，"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33）。"共享愉悦"是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路径，何为愉悦？为何愉悦？愉悦何为？殷企平所关注的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构成了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提升人类生存境遇的人文认知前提。

在情感史的视角下，殷企平的"文化即批判"绝非冰冷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一套极具温情的情感治理方案。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从"文明的辩护者"转变为"文明的批判者"，殷企平的突破在于他揭示了"文化"概念在19世纪变迁大潮中所经历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文学研究本身，它触及到了思想史上一个核心命题：当工业文明以"进步"之名撕裂社会有机体之时，文化何为？殷企平通过对卡莱尔（Thomas Carlyle）、阿诺德（Matthew Arnold）、罗斯金（John Ruskin）、金斯利、莫里斯（William Morris）等人的系统研究，以充沛的情感逻辑和绵密的细节考掘证明了文化批评"反对'分离'，抗拒异化，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48）。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19世纪英国经历了最重要的内涵演变"（殷企平，"经由维多利亚文学的文化观念流变" 83），其成熟标志恰恰是它与"文明"的彻底决裂。这一观念史事件的揭示，使"文化即批判"在思想与文本的激荡之中获得了坚实的历史根基，文化不再是精英群体口中的标签，而是一种不断提出质疑、持续守护人文价值的建构性力量。利维斯对功利主义以及精英文化衰落的焦虑、威廉斯对文化同质与生存性危机的焦虑、伊格尔顿对审美幻象与政治权力的焦虑，都在"转型焦虑"的概念框架中获得了新的整合与提升，殷企平没有停留于对变迁表象的审美诊断，而是将焦虑转化为一种体现情感内涵的批判动力。由此，"转型焦虑"不再是一种被动的精神体验，已转化为一种主动的反思立场，不断召唤着读者如何在分裂时代重新锚定共同体的新价值坐标。

Works Cited

G.K. 切斯特顿：《改变就是进步？——切斯特顿随笔》，刘志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

[Chesterton, G.K. *Change Is Progress? — Chesterton's Essays*, translated by Liu Zhigang. Shanghai: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Eagleton, Terry.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Yin Zhike. Kaifeng: Henan UP, 2017.]

——：《审美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translated by Wang Jie, Fu Degen and Mai Yongxio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1.]

雷蒙德 •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 translated by Han Ziman, Liu Ge and Xu Shansh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

[—.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translated by Gao Xiaol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8.]

殷企平：“转型焦虑：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外国语》3（2018）：99-106。

[—. “The Anxiety over Transition: *The Death of the Heart* midst Changes in the Idea of Cultur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3 (2018): 99-106.]

——：《“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

[Yin Qiping. *“The Cultural Defense Document”—British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经由维多利亚文学的文化观念流变”，《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5（2017）：83-91。

[—. “Changes in the Idea of Culture in the Midst of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 (2017): 83-91.]

——：“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4-54。

[—. “The Common Reader.” *Foreign Literature* 6 (2019): 44-54.]

——：“作为秩序的文化：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2017）：41-49。

[—. “Culture as Order: Edmund Burke’s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7): 41-49.]

——：“纽曼大学观探微”，《杭州大学学报》3（1992）：142-148。

[—. “The Exploration of Newman’s Ideas of a University.” *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3 (1992): 142-148.]

——：“《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外国文学研究》6（2025）：26-37。

[—. “Iron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appiness in *Emm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5): 26-37.]

——：“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6-33。

[—. “Literary Classics and Shared Pleasure.” *Dongwu Academic* 6 (2023): 26-33.]

——：“夜尽了，昼将至：《多佛海滩》的文化命题”，《外国文学评论》4（2010）：80-91。

[—. “The Night Has Ended and the Day is Approaching: The Cultural Theme of *Dover Beach*.”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10): 80-91.]

——：“对所谓《艰难时世》中‘败笔’的思考”，《外国文学研究》1（2003）：21-25+171。

[—. “On the ‘Failure’ of *Hard Tim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3): 21-25+171.]

——：“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英语研究》12（2020）：39-49。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iticism.” *English Studies* 12 (2020): 39-49.]

——：《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

[—. *Rereading the Discourse of “Progress”—New-Type Novels in 19th-Century Britai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用理论支撑阅读——也谈利维斯的启示”，《外国文学》5（1999）：50-52。

[—. “Supporting Reading with Theory—Also on the Insights of Leavis.” *Foreign Literature* 5 (1999): 50-52.]

——：“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 “Towards Public Spirit: Eagleton’s Views on Taste.” *Foreign Literature* 6 (2022): 71-80.]

殷企平、胡玲玲：“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的情感结构”，《外语教学》1（2003）：86-89。

[Yin Qiping and Hu Lingling. “On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The Way We Live Now.*”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1 (2003): 86-89.]

殷企平、胡强：“文化观念流变与英国文学典籍研究”，《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1（2020）：1-12。

[Yin Qiping and Hu Qiang. “The Evolution of Ideas of Culture and British Literary Classics.”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 (2020): 1-12.]